

51
e. 2 v. 3



四海升平

下

1994年1月1日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主编 陈漱渝

回应韦君宜

邢小群 孙珉 编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一本“老豆腐账”？

——韦君宜《思痛录》读后

鄢烈山

牧惠先生向我推荐韦君宜新出版的《思痛录》，说这是一本“大彻大悟”的书。因此，我才推开案头所有正在读的书，从头到尾看完了它。

的确，这是继巴金《真话集》后又一本讲真话的“大书”，虽然只有薄薄的十二万字，而且，由于作者早年就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后长期在文艺出版界做领导工作，对上层活动的经历、见闻远比巴金丰富、真切，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心路历程的展现与反思更为巴金所无法比拟。

韦君宜出身于富族大家，是清华园里的高材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出于一片爱国赤诚和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失望，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投奔共产党抗日救国。《思痛录》就从延安的“抢救运动”“思”起，写到“文革”十年及“文革”后的一段时间，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和她

的丈夫杨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老王（《天安门持抄》的编者）等人，是怎样由信徒（不仅是主义的信徒，还是领袖与“组织”上的信徒）变成质疑者的。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着阴险、卑鄙、冷酷，完全超出了这些心地纯真的善良人的想象能力。上面说胡风是“反革命”，于是，感到的是震撼和领袖的英明，并不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第132页）虽然自己在“抢救运动”中曾无故被冤，且整个抢救运动后来证明全是冤假错案，韦君宜们直到“文革”初期仍在真诚地检讨自己。是一连串的“左”祸，才使她及杨述这样惯于“以上级思想为思想”的人不得不逐渐醒悟，现实“真是逼得石头也要说话了。”（第131页）

韦君宜是真诚的，她没有说“青春无悔”之类鬼话。在“反右”运动中就私下对黄秋耘讲过：“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第45页）趋利避害，不做无谓的自我牺牲，难道不是更符合人的本性和社会利益吗？尽管如此，我相信韦君宜还有许多想讲的话没有讲出来。韦君宜说要讲出自内心的真话，哪怕是真正的歌颂——歌颂对极左路线的否定，“至今还不能多谈”，不然就会“被说成要弄乱啦，造成工作困难啦，别有用心啦。”（第182—183页）。这是来自“习惯势力”的阻力和压制，韦君宜这本小册子延宕数年，迟至今天才勉强问世即其表现。

另一方面，这样的话题已不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所

关心，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说实话，当代人的回忆录我就一概不看，这本书是例外。

对于我来说，一是觉得如今距离太近，忌讳尚多，许多历史真相还“宜粗不宜细”，很难从这类回忆材料中获得与所花时间成比例的新知；二是对前辈人之间纠葛不感兴趣，觉得他们或多或少跟周扬的命运相似，整人，被人整，是非恩怨大抵是革命家庭内部的拆烂污，一本“老豆腐账”！——“老豆腐账”这个词语即从《思痛录》中借用的。韦君宜说，50年代她与郭小川、袁水拍这些人，对周扬、丁玲之间的历史纠葛不想介入，不想评判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我们这些年轻了十好几岁的人，哪会对他们的那些老豆腐账那么感兴趣呢”（第38页），而今我们这辈对韦君宜们的往事亦大抵作如是观。

而我们这一辈人在四十岁以下的“新人类”、“新新人类”心中，是有“政治情结”的一代，已经“过气”了。当今是以金钱多寡判别成功与否的商业时代，不仅年轻人，大多数关心的是如何“先富起来”。这又是一个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的时代，年轻人们注重的是及时行乐。他们要玩“酷”扮靓，追求的是如何与发达国家的人们同步时髦，争先恐后谈泰坦尼克号、乔丹、世界杯、巴黎的时装品牌之类，生怕背上out（老土、背时）的恶谥被谁踢“出局”，哪有心思来“思”什么“痛”？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对。我若年轻也会如此。韦君宜的这本小册子是“百年人生丛书”之一，这使我想起

马致远的曲子《秋思》：“百年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实在不必有什么“政治情结”呀！

但对于那些遭受了不公正历史待遇的人来说，这是新的不公正：他们熬到如今，幸而不死，连几句无补于事的公道话也听不到，何以抚慰饱受创痛的心？

正像韦君宜在讲述她的夫君、带领母亲和弟妹一起毁家投奔革命的杨述，到1978年底去世仍未得平反的悲惨结局时所说：“这简直像开玩笑，但是我们这个人间就是这样残酷的玩笑。”（第133页）

不独中国有这样的玩笑。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玩笑》中早已揭示了这样的悲剧：“卢德维克（小说主人公、捷共党员）和其余的人又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的玩笑的圈套：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该书自序）同样的，卢德维克们后来想向年轻人讲清楚当年的分歧所在、“误会”因由等等时，却发现已没了听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谁真诚谁悲劣已只有自言自语了。

韦君宜们何尝不清楚，讨到了个人的公道又怎样呢？过去的日子已如逝水东去不复返，高尚者至多讨得一声高尚的墓志铭。她们是想呼唤年轻人，“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付出的牺牲”，珍惜他们以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思想解放

的局面，从此不再妄信妄从，从此永不放弃思考与自由。（第134页）

我们的年轻人不理睬她（他）们的呼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下一代人活得比他们明白，不重蹈覆辙，韦君宜们当可悄然隐去。中国的悲剧，比他们个人的不幸更大的悲剧在于：年轻的一代分明没有走出极“左”时代留下的阴影，那些自以为“潮”的年轻人仍被“旧时期”的梦魇纠缠着。

我曾乐观地认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年代长大，接受外来信息的渠道既多且宽，受世界潮流影响甚巨，一定比我们这些所谓“第三代人”思想开放，见解高明。但这几年的所见所闻已经极大地摧毁了我的这一盲信加妄信。

想不到，留学海外的青年博士、学者居然可以用他在西方学到的理论，从“大跃进”中发现毛泽东先进的经济思想，并用他的学理振振有辞地鼓吹“发挥‘文革’中合理的因素”。（参见《交锋》第377页）想不到，几个“说不”小子居然敢给“文革受难遗族们”控诉文革加上“从精神上逃离中国和抛弃中国”的罪名（《中国还是能说不》第369页），而并没有因此遭到多少人的抗议和谴责。想不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即“对着干”的思想，竟深得那么多年轻人之心，不仅在中美发生摩擦时，《中国可以说不》可以疯魔全国青年，在中美已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今天，清华园的高材生仍然会把伊拉克人民遭受的苦难归咎于美国，当面质问美国大使，而不是归咎于专制暴君、超级狂

人萨达姆；而他们的这副似曾相识的腔调居然还被颂为反对美国霸权的“傲骨”使然！（参见《南风窗》今年第6期《清华学子“挑战”美国大使》）

我们的年轻人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韦君宜先生在病床上如果还能接受外界信息，对此将情何以堪？她将死不瞑目，还是为自己的《思痛录》并非过时之物，尚有不可低估的镜鉴醒世作用而感到欣慰呢？我想，二者对她都是痛苦的。

（原载《杂文界》1998年第4期）

你一定要看《思痛录》

董大中

这个题目是抄袭，或者说模仿。有一本书叫《你一定要看董桥》，陈子善编。董桥是散文家，书中所收也都是散文，“你”当限于喜欢散文的人。《思痛录》却不是这样。这是一本讲中国革命的书，讲你自己的身边事情的书。当然它不是历史，不是正儿八经的革命史。它只是一个侧影，记的是作者自己所经过、所见过、所听说的一些事情，从延安搞“抢救失足者”，经过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过那大“革”文化“命”的痛苦十年，直到“十年之后”，作者都写到了，重在文艺界，却又不限于文艺界，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文艺，只要你知道一点这多少年来中国人民、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熬过来的，只要你想重温一下那像树影一样已经消失了的日子，你都应当找来这本书，躺在床上，坐在沙发上，或者在田间地头、马路旁边，把它读一读。它把过去多年的“运动”讲活了，它是值得你读的。

作者韦君宜，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革命。不久她投奔延安，编《中国青年》。建国以后她先后在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处工作。她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也“下放”过，还上过“五七干校”。她这样的经历，使她能够知道许多我们普通人无法知道的事情。1942年作者在延安以北的绥德地委编《抗战报》，突然听说要“审查干部”，接着是“抢救失足者”。如何“抢救”？是让所有的人“坦白”，并且互相“揭发”。绥德师范被当作“特务窝”，教师是特务，学生也是特务。当特务的女学生，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色队”……“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结果当然全是假的，然而已有许多人被整死。或终生成为残废。这可以看作后来一系列运动的预演或“彩排”。无论“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还是触及人们灵魂更触及皮肉的“文化大革命”，哪一场运动不是以“革命的名义”，依靠莫须有、逼供信（有的地方称为“信供逼”），诬陷好人，排除异己。“抢救”后期毛泽东在一次大会上举手行礼，说“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建国后误伤了那么多人，有谁站出来担负责任？作者所举大量例子，有的当时报纸上发表过，连笔者也知道，“事实”就是那样，还有许多，不是作者的同事、同学，便是她的亲戚、熟人，有名有姓，无一虚假。书中记述的不少事例，离奇到让你无法相信，可它又是活生生的存在。

在这本书中，作者写到了她自己思想上的变化。跟一切革命青年一样，作者最初是单纯而且幼稚的，当听说“审查干部”是要揭发特务时，几乎以为领导“说错了话”，当第一次看到“特务”在会上“坦白交代”时，它“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当听说揭出一个“四川伪党”时，她认为“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由于作者担负领导工作，她不能不出面搞一些活动，她说，她有时是“违心”搞的；同事写了有违当时的宣传口径的文章，她也曾“违背良心”，撰文批判；她还曾“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作者“悲痛失望”，她说：“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作者还写到她几次到大寨、大庆、小靳庄、大连红旗造船厂等模范单位参观所看到虚假现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宣传这些模范单位“事迹”的读物所感到的内心痛苦。她说：“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这不仅仅是作者一个人的痛苦和懊悔，也是许多“过来人”的共同心理，连周扬这个文艺界的大权威，最后也在痛苦的反思中，为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个人，一个民族，犯错误不怕，怕的是不能反思，不能改正。这本书的价值，既在于它如实描写了那

些动人心弦又让人撕心裂肺的无数整人事例，也在于它有力表现了中国有良知的一代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新的觉醒。书中说：“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又说，“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不够。”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过去一切悲剧的发生，既跟掌权者个人有关，既跟“中国的可怜的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有关，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体制问题。要害在于运用权力自由化，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把谁打倒就打倒谁。人民本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主人的话能说出来吗？更不要说起不起作用了。书中几次写到“把人不当人”的问题。肆意整人，是对那些人的人格的最大侮辱，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人”又有什么意义？

书中所写的一切，几乎全部发生在三中全会以前，现在近四十岁以下的人没有经过；书中所写“反右”以前的事情，现在近六十岁以下的人没有经过；书中所写“抢救运动”，现在有百分之九十五、也可能百分九十九以上的人没有经过。过去有名言：“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历史，有光明的一面，也有不光明的一面，甚至让人撕心裂肺、给人以无数深刻教训的一面。我们要记着光明，但也不能忘记了黑暗，甚至更应当记着黑暗。记住殷鉴，才能清醒地看到正确的路在哪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本《思痛录》你一定要看。让我们“痛定思痛”，深化改革。

（1998年7月31日）

韦君宜的新书

谢 泳

前一段牧惠先生转给我一篇韦君宜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文化大革命拾零》，这是韦先生晚年回忆录《思痛录》中的一章，这是我已见到过的文革回忆录中最让人震动的一篇，这是韦先生在病床上完成的，可以想见这位文化老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她有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仅读了这本书中的一章，但我的感受是一本说真话的书。韦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是彻底的，反思是深刻的，这本书对我的触动超过了我当年读巴金先生《随想录》，也超过了我读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这是两种不同的阅读感受，他们都是让人敬重的老人，但韦先生的文章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韦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离开了富有的家庭，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去了延安，但她的理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去年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我读了她的新作《露沙的路》，是写延安抢救运动

的。那本书虽然没有多么轰动，但在知识界却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读了韦先生的这本书，都对她肃然起敬。她对那场抢救运动的分析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她对那场运动的起源以及那场运动主要责任人的评价，都不同于以往我们一般的认识。她是那场运动的见证人，她的回忆是真诚的，是对历史负责的。韦先生的反思还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比如她对知青在文革中的经历就超越了人们的日常经验，特别是她对那后来成了作家的知青是这样评价的：“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黄河》杂志 1998 年 3 期）我们已有那么多对知青小说的分析和评价，有了那么多对知青作家的剖析，但这个角度，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还是极富启发性的。韦先生的这本回忆录几经周折，最近将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在做过一些删节后出版发行，这是一件虽有遗憾但也令人安慰的事。我听牧惠先生说，韦先生现在已失去了再写作的能力，也不能再思考了，她本来应该能够早日看

到自己这本书的出版，但由于我们的出版制度，韦先生的回忆录被延滞了许久，韦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重病人，经不起再拖了。

（原载《博览群书》1998年6期）

劝劝自己的前辈

谢 泳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现在还能思考，还能写文章的已经不是很多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老人多数都有一肚子话要告诉人们，但他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大愿意把话说明白，总是要回避一些人们最想知道的东西。人到老年，按说应该是有话就说了，没有必要再躲躲闪闪。但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是经历的苦难太多，或者是有其他考虑，总要把他最想说的话留到最后才说，而且总是那么一点点。那年赵丹临终才说了一句痛快话，大意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到老年，很重要的一点是周围要有一些明白人，子女也好，朋友也好，这些人对他们的思想往往很起作用。这些年来那些受到人们尊敬的老人，多数身边都有一些好帮手，老年人加上小朋友，他们才能多说一些痛快话。所以有时候我想，那些有条件接触老年知识分子的年轻朋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劝劝那些前辈，让他们少一点顾虑，尽可能为后人留下一